



EISU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第四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四辑

EAST ASIAN

东方语言学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语言学.第4辑/潘悟云,陆炳甫主编.一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444-2247-5

I.东… II.①潘…②陆… III.汉语-语言学-期刊
IV.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6156号

东方语言学

第4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上海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插页 2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

ISBN 978-7-5444-2247-5/H·0098 定价:31.00元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上海教育出版社电话:64377165

主 编 潘悟云 陆丙甫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 (北京大学)

戴耀晶 (复旦大学)

黄锦章 (上海财经大学)

江 荻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李宇明 (教育部语言信息司)

刘丹青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马庆株 (南开大学)

潘悟云 (上海师大语言研究所)

钱乃荣 (上海大学)

沈锺伟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史有为 (日本明海大学)

唐钰明 (中山大学)

吴安其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徐烈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杨 宁 (复旦大学)

张洪明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朱庆之 (北京大学)

戴浩一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冯胜利 (美国哈佛大学)

黄 行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金立鑫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大为 (复旦大学)

陆丙甫 (南昌大学)

麦 耘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齐沪扬 (上海师大对外汉语学院)

邵敬敏 (暨南大学)

石 锋 (南开大学)

孙朝奋 (美国斯坦福大学)

汪维辉 (南京大学)

吴福祥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杨剑桥 (复旦大学)

游汝杰 (复旦大学)

张 宁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朱晓农 (香港科技大学)

目 录

反问句对于语义变化的影响·····董秀芳	1
试论量词“串”对名词选择的范畴化过程·····宗守云	10
了然于心·预料之中·出乎预料·····唐正大	18
汉语方言中的 f、h 相混现象·····叶晓峰	37
广东省客家方言的界定、划分及相关问题·····庄初升	44
论汉语、苗瑶语声母中流音 r、l 的重建及古音构拟偏向···郑张尚芳	57
上古汉语动词内部的达及态构词·····王月婷	63
最新派上海市区方言语音的研究分析·····顾钦	70
国际音标的命名与中文定名·····左玉璩 江荻	129
音节和音节学·····朱晓农	142
分子人类学与当代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徐文堪	165
《尚书》文本考·····吴安其	181
音变的语音学基础(二)·····J. J. Ohala	201

反问句环境对于语义变化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文系 董秀芳

内容提要：在汉语发展史上，很多形式的语义变化都是在反问句环境中发生的。这可以分为四种情况：（1）在反问句中发展出表示建议或规劝的副词；（2）在反问句中发展出具有意外意味、表示逆向连接的话语标记以及表示不确定性的副词性插入语；（3）在反问句中发展出疑问副词；（4）在反问句中发展出强调副词。在反问句中发生的这些语义变化都与反问句的否定和反诘语气有关。反问句的否定性使一些成分的语义发生了由肯定向否定或由否定向肯定的转移。反问句的反诘语气可以被某个句中成分所承载并进一步变成表示一般疑问的标记，反诘语气可以看作一种强调，反问句就是一种加强的否定形式，所以在反问句中可以发展出强调标记。

关键词：反问句 语义变化 隐含义 语义化

0. 引论

一个形式的语法语义变化不是孤立地发生的，而是一定发生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这一点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汉语发展史上，很多形式的语法语义变化都与反问句语境有关。

反问句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句式，句子表面是疑问形式，可以含有疑问词，但说话者的态度和意见很明确，并不需要听话者的回答，虽然听话者有时也会做出辩驳。有些反问句有专门的反诘副词，如“难道”等，但不少反问句在表面形式上与有疑而问的句子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带有反诘语气，在口语中用一些韵律手段来表达，在书面上就只能通过上下文语义来判断一个句子是真性疑问还是反问。也就是说，反问句属于语用层面的现象，表达了加强的否定态度，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表达。反问句中发生的语法语义变化可看作语用对于语法语义的影响。

本文总结了在反问句中发生的语义变化的几种情况，并分析了变化发生的原因。

1. 在反问句环境中形成的表建议/规劝的副词

笔者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姜宝英（2008）对表示提议或规劝义的“何X”进行了历时考察。本文进一步申论如下。

表示建议的“何不”“何妨”、表示规劝的“何必”“何苦”都是在反问句环境中形成的。

*本文曾在“首届历史语言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云南澄江，2008年7月）上宣读，感谢吴福祥、孙景涛、麦耘等先生提出的宝贵意见。

何不

“何不”最初是一个跨层组合,“何”与“不”并不在一个句法层次上。“何不+VP”层次为[何[不VP]],先是用于真性疑问句,“何”询问“不VP”的原因,“不VP”表示的事态是已然成为事实的。其后一般都跟有听话人针对原因的回答。如:

(1)人谓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国语·晋语二》)

(2)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不受,军吏曰:“可无劳师而得城,子何不为?”(《国语·晋语九》)

询问别人不做某事的原因,往往是因为说话人认为有做某事的必要或价值。因此在以上“何不VP”的句子中往往隐含着应当VP这样的意思。真性疑问句可以不改变形式就变为反诘问。当句子是反诘问时,这种隐含义就更为强烈,变为一种规约性隐含义(conventionalized implicature)(Traugott & Dasher, 2002)。如:

(3)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逍遥游》)

(4)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

(5)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史记·秦始皇本纪》)

“何不”就是在反诘句中发展为表示建议的副词。当反诘问的规约性隐含义“应该VP”语义化(semanticized)之后,“何”与“不”就由两个独立的词词汇化为一个单一的词。当“何不”变为一个表示建议的副词之后,句子中的VP表达的是将来的事态,即说话人建议听话人去实施VP这一行为。其后可以跟有听话人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建议的应答。如:

(6)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韩非子·内储说上》)

(7)涛涂谓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且归?”桓公曰:“诺。”(《公羊传·僖公四年》)

英语中表示建议的固定短语why not也有类似的来源。

何妨

“何妨”本义为“妨碍什么”,或说“有什么妨碍”。可以看作动宾结构,“何”是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如:

(8)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战国策·秦二》)

(9)有不知之性,何妨为仁之行?(《论衡·问孔》)

(10)从事醒归应不可,使君醉到亦何妨。(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

(11)纵使从来不相识,错相识认有何妨。(《敦煌变文集新书·伍子胥变文》)

“何妨”的后面可以用“于”引进名词性成分(有时“于”也可省略),也可以出现动词性成分。当“何妨”后是动词性成分时,句义为“做某事有什么妨碍”。在反问句中,句义实际相当于“做某事没有什么妨碍”,其隐含义是“可以做某事”。当这种隐含义固化后,“何妨”就发生了词汇化,变为表示建议的副词。如:

(12) 沙弥问:“前程如何?”老人曰:“法公何用忙,这里有肉身菩萨出世,兼是罗汉僧造院主,何妨上山礼拜?”沙弥才得个消息,便到药山,换衣服直上法堂,礼拜和尚。(《祖堂集》卷一零九)

何苦

“何苦”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何必自寻苦恼,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不值得。”“何苦”与“何妨”一样最初也是一个动宾式结构,“何”是及物动词“苦”的前置宾语。“苦”作动词相当于“苦于”,有“受……的苦”“为……发愁”义。如:

(13) 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盐铁论·非鞅》)

“何苦”可以单用,也可以后接动词性词语,中间可用“而”作为连接。如:

(14) 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谕谓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汉书·黥布传》)

(15)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说苑·正谏》)

用于真性疑问的时候,“何苦(而)VP”问的是“由于什么样的困扰而VP”;用在反问句中时,“何苦VP”隐含着否定做VP的理由,就是否定必须要做VP的某种困苦、烦恼的存在。

(16) 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史记·高祖本纪》)

“何苦VP”在反问句中获得了“不值得VP”的含义,因此,后来“何苦”词汇化了,可以用来规劝别人不做VP。如:

(17) 及神武入洛,椿谓贺拔胜曰:“今天下事在吾与君,若不先制人,将为人所制。高欢初至,图之不难。”胜曰:“彼有心于人,害之不详。比数夜与欢同宿,具序往昔之怀,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惮之!”(《北史·斛斯椿传》)

何必(参看董秀芳2002)

“何必”原来也是一个跨层组合,“何”与“必”并不在一个句法层次上。“何必X”的内部层次是:[何[必X]]。X既可以是名词性成分,也可以是谓词性成分。在上古汉语中就经常用在反诘问句中,如:

(18) 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左传·成公二年》)

(19)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乡党第十》)

(20) 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韩非子·六反》)

(21) 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韩非子·难势第四十》)

“何必VP”用在反问句中,是对“必VP”的质疑,其隐含义就是“VP不是必要的”。这样的隐含义慢慢固化为“何必”的语义,再经过语用推理,就变成了“不要VP”:既然VP不是必要的,就可以不做VP。因此,“何必”就发生了词汇化,变为一个表示规劝的副词。如:

(22) 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后汉书·乐恢传》）

(23) 范容期见郗超俗情不淡，戏之曰：“夷、齐、巢、许一诣垂名。何必劳神苦形，支策据梧邪？”（《世说新语·排调》）

当“何必”是一个跨层结构时，“何”与“必”的分立性大，“必”的“一定”义很明显。“何必……”是诘问为什么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选方案中，一定要选择某一种而不选择其他的。如“何必是”中，“是”是与其他“美妇人”相对而言的。而当“何必”从一个跨层结构变为词后，“何”与“必”之间的分立性被取消，“何必”是以疑问的方式表示不赞同某人的某种做法，这一做法可能并不是几种可选方案中的一种，可能根本是不可取的。在例（22）中“以言取怨”从语义上看是消极性的，不是几种可选方案中的一种，“何必”是在用疑问的方式否定其后成分所表示的行为，“必”的“一定”义已经很不明显了。

建议和规劝都属于委婉的祈使，即让别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建议是肯定性的祈使（可以VP），规劝是否定性的祈使（不要VP）。“何不”“何妨”“何必”“何苦”在表达建议和规劝时还保留了问句的形式（不过已不再是反问句），有时句末还出现语气词“呢”。用问句的形式表示祈使的意义在其他语言中也存在，如英语中的“Why don't you come here and have a cup of tea?”因为问句的形式可以使祈使的内容更委婉。

2. 在反问句中形成的表意外或不确定的话语标记或情态成分

“谁知/谁知道”在反问句的语境中发展出引进意外事态的话语标记用法（董秀芳2007）。“谁知”在上古汉语中已出现，是一个主谓短语，可以用于真性疑问，也可以用于反问句。如：

(24)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诗经·魏风·园有桃》）

(25) 不言，谁知其志？（《左传·昭公三年》）

大约在唐代时，“谁知”发生了词汇化，产生出了话语标记的用法。如：

(26) 有意嫌兵使，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踏蹬，几落省墙东。（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

(27) 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俄顷中间，数回相接。谁知可憎病鹊，夜半惊人；薄媚狂鸡，三更唱晓。（唐张籍《游仙窟》）

(28) 自小阿娘台举，长成严父教招，谁知近来稍似成人，却学弃背恩德。（《敦煌变文集新书·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谁知”表明其后的话语相对于前面的叙述来讲，并不是一种正态的发展，而是出乎说话人意料，与常规的预期不符。

现代汉语中双音形式“知道”已经替代了单音形式“知”作为动词使用。“谁知道”也和“谁知”一样具有话语标记的功能，例如：

(29) 她弯下身子，想把那小女孩抱起来，谁知道，那小女孩忽然抬起脚来，对著阿香就一脚踢了过去，……

(30) 十月间，老两口到北京，穆青专门在海味餐厅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谁知道这顿饭竟给老人闹下了笑话。

(31) 金枝自己拿钥匙打开了院门，本想轻手蹑脚地回自己的屋，省得惊动别人，谁

知道西厢房里还亮着灯，随后门开了，杨妈从里面迎了过来。

(32) 现时叫咱们学大寨，国家又不贴钱，那得凭咱们多吃点苦，多闹点副业挣钱。谁知道今年运动一来，我又差点挨了批，说是重副轻农，发展资本主义。

“谁知/谁知道”的话语标记功能与在反问句环境中获得的否定含义有关。“谁知/谁知道”用于反问句中表达的是“没有人知道”，也就是“不知道”的意思，既然先前不知道某一情况会发生，自然这一情况的实际出现就是出乎意料的了。

另外，“哪知道”“谁料”“谁成想”等惯用语也具有类似的话语标记功能，它们也都是在反问句环境中产生的。

“谁知道”在现代汉语中还可以作为副词性插入语，具有情态义，表明说写者对某个事实是否会出现的不确定、没把握的态度，把它去掉也不会影响命题的真值。如：

(33) 谁知道呢，也许他会输得精赤条条，无颜见江东父老；也许他会成为阔佬，那奔驰车再也无法驶进文学的小道。

(34) 谁知道，也许，都在一个城市里，没准哪天就遇到了。

(35) 想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也许你不会有这种感觉，谁知道呢？

(36)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以上例中的“谁知道”可以说已经熟语化(idiomatize)了，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词汇化了，应看作一个独立的类似词的单位，从功能上可以看作一个认知性插入语(epistemic parentheticals)(Traugott & Dasher, 2002)，表明说写者对于命题真实性的态度，其辖域(scope)为整个句子。这种用法仍与“谁知道”从反问句中获得的否定含义相关，既然没有人知道，自然也就无法确定^①。

英语中的who knows作为一个惯用语，也可以表示不确定的情态，其语义变化也是源自在反问句中的使用。

3. 疑问代词在否定句中发展出否定功能

姜炜、石毓智(2008)指出，“什么”在现代汉语口语中是一个使用很普遍的否定手段，可以用在谓语动词或形容词后，也可用在名词或引语前表示否定。如：

(37) 你跑什么，还有事跟你说呢！

(38) 刘姥姥笑道：“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们想这么着也不能。”贾母道：“什么福，不过是老废物罢了。”(《红楼梦》第三十九回)

姜炜、石毓智指出，表示否定的“什么”源自询问目的的“做什么”在反问句中的用法。据吕叔湘(1992: 138-139)考察，从唐末以来的近代汉语中，“做什么”有两个位置：一是放在动词前询问原因，一是放在动词后询问目的。放在动词后的例子如：

(39) 何不问自家意旨，问他意旨做什么？(《祖堂集》3.55)

(40) 你要投水做什么？(清平山堂话本2.9)

(41) 龙老三，你又来做甚么？(《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

姜炜、石毓智认为，现代汉语的否定标记“什么”就来自于上述询问目的的“做什么”。

^①这种用法是“谁知道”独有的，是后起的发展，“谁知”没有这种用法。

询问目的的“做什么”所在的句子多为反问句，用来指出“做某事的目的是不必要的或不应该的”，从而表示对前面的动词所指行为的合理性的否定。“做什么”在谓语中心动词之后开始词汇化和语法化，进而又引起形式上的弱化，由原来三个音节变成两个音节，宋元以后出现了“则甚”“则么”“自么”等形式，到清代，形式逐渐固定在“什么（甚么）”一种上。

“VP什么”通过否定行为的目的的合理性，来表达不希望行为继续发生，或劝阻、制止行为继续发生。有时可用“别VP”来替换，表示的是一种禁止性的命令。

姜炜、石毓智认为，“什么”放在名词和句子之前的表示否定的用法可能来自以下两种完整句子的省略：1)“S+是+(什么+NP)”，如果省略掉主语和判断词，就成了“什么+NP”。比如“这是什么大事”省略后就成了“什么大事”。2)“什么+是+X”。X多为对方话语中的一部分。省略其中的判断词就得到“什么”直接修饰引语的表达。如：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红楼梦》二十二回)。实际上这两类句子也可以看作是反问句，具有否定的隐含义，“什么”的功用是指出“达不到某种标准”或者“不符合某种资格”。

表示谦虚的惯用语“哪里”也是来自反问句，继承的也是反问句中产生的否定义，用于对别人的赞美的回应，谦虚地表示自己不具备对方所称赞的优点。

反问句本身就具有否定功能，疑问句中疑问词是焦点，因而反问句中否定的含义就很容易落在疑问词身上。这样，反问句中的疑问成分在发展过程中变为否定成分就是可以理解的。

4. 在反问句中形成的疑问副词

江蓝生(1992)研究了“敢”“可”从助动词变为疑问副词的原因，指出这种演变是由于在反问句中的使用。

“敢”是个助动词，有“可、能、会”等义。早在上古，当“敢”出现在反问句中时，就相当于“岂敢”，如：

(42) 周不爱鼎，郑敢爱田？(《左传·昭公十二年》)(对比《史记·楚世家》：“郑安敢爱田？”)

(43)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44) 曾是共治情，敢忘恤贫病？(谢眺《赋贫民田》)

(45) 齐人敢为俗，蜀物岂随身？(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敢”与“岂”对文同义)

“敢”演变为疑问副词是在反问句这种语境中形成的。(1)“敢”位于动词之前，其位置与疑问副词相当；(2)在反问句中，“敢”的语义与它原来的意义正相反，犹“不敢”，用疑问形式表现就是“安敢”“岂敢”。由于这种句式的惯用，便使“敢”具有了反诘的意味，进而虚化为一个疑问副词。现代汉语山西、陕西等北方方言仍使用，如：你敢不知道？其中的“敢”表示反诘。

《现代汉语词典》对“可”的疑问副词用法的解释是：“用在疑问句里加强疑问的语气：这件事他可愿意？你可曾跟他谈过这个问题？”江蓝生认为，这种解释不够确切，实际上

“可”表示一种询问的语气，用了“可”使语气变得和缓。

“可”本来也是助动词，也是在反问句中变为反诘副词，并进一步变为疑问副词的。

表示反诘的“可”从东汉时即出现，到唐代以后使用十分普遍。如：

(46) 齐鲁接壤，赏罚同时。设齐赏鲁罚，所致宜殊，当时可齐国温，鲁地寒乎？（《论衡·寒温》）

(47) 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从？（《搜神记》卷一）

(48)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世说新语·贤媛》）

(49) 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白居易《苦热题恒寂师禅室诗》）

后来“可”又可用于一般疑问句中，如：

(50) 可能舍得己身，与我充为高座？（《敦煌变文集·妙法莲花经讲经文》）

(51) 善恶二根，可是菩提耶？（《祖堂集》卷一）

(52) 杨子可曾过这里，可曾见此春风面？（宋方岳《白牡丹》诗）

“敢”“可”从助动词发展为疑问副词是由于长期用于反问句中从而携带上了反问句的反诘语气。这种变化可以看作句中成分对句子意义的吸收，本质上是由转喻机制造成的，即以部分转指整体。

5. 从反问句中发展出表强调的副词

在现代汉语中，“可”作为副词可以表示强调。如：

(53) 他可不是好惹的。

“可”的强调用法，也可以追溯到在反问句中的使用。从上一节的论述中已知“可”在反问句中首先发展为一个反诘疑问副词，江蓝生（1992）指出，北京话表示赞同的“可不是”（义为“岂不是”“怎么不是”）中的“可”就是表示反诘义的用法的残留。从反诘义可以自然地发展出强调义，因为反诘语气已经强烈地表明了说话人的态度，是一种加强的否定形式，因此“可”从反诘副词发展为强调副词。

与此相类似的是“不是”在口语中的一种确认用法。口语中有一种“不是VP”句式，“不是”与句末的“吗，啊，么，呢么”等语气词配合使用，这些语气词也可以不出现。这种句式出现在叙述过程中，带有强调确认语气。这种句式的源头应该是反问句。“不是”可以用在反问句中，实际句义是肯定的。如：

(54)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怎么还在这儿？

我们所要讨论的“不是VP”句中“不是”的反诘语气已经隐去，用来引入一个说话者主观认为听话者也知道的信息，带有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有时也说成“这不是”或“那不是”。如（例子来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的北京口语部分）：

(55) 你知道，在朱元璋的时候儿，明代的时候，朱元璋不是，N，他，这个，占领北京吗？占领北京，以后呢，然后N，他死了，死了以后把那儿子封到那个，南京。

(56) 一刚解放时，不是兴列宁服啊，想做那么一件衣服，都做不是。

(57)那小孩儿就告诉说的说的你看,就是他,他不是在那吃饭么,他说我使他饭碗了。

(58)唱大鼓的,拉洋片的,拉洋片,大金牙拉洋片,不是报纸上登着呢么,你要说大金牙拉洋片,大金牙,那会儿我跟他闺女小时候儿住街坊。

(59)N,早就这不是我爷爷那一代,就在蓝旗住。

(60)甚至于,那不是报纸上也登过,就那请安那个姿势,溥杰先生还作过示范吗。

“不是”的位置也可以在句末,如:

(61)那山东比较苦不是,没办法就奔东三省。

(62)这儿,在北大,我妈没工作,就跟家呆着。(我爸)就是现在退休了不是,……。

(63)然后到他们那儿去了,一小孩儿比我还小不是,十,十,没上,就是上初三,就没上学,就是不上了。

(64)别看吵架不是,还得说是一母同胞。

(65)您请坐,您喝水不是,都是您。

可以说口语中的这种“不是”有词汇化倾向,主要功能是强调其后信息是听说双方的共享信息,这种共享性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只是说话者的一种假定,用来提高对听话者的关注度。用在句末的“不是”的词汇化程度更高,一方面是与反问句在形式上已经不同了,另一方面语气词一般出现在句末,“不是”出现在语气词通常出现的位置,说明“不是”也可以看作一个语气词了。

很显然,“不是”的表确认语气的用法也是脱胎于在反问句中的使用,是对反问句中所隐含的强调语气的一种发展。

6. 结论

综上所述,反问句环境对于一些语法语义变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句义所具有的肯定性隐含义和否定性隐含义可能语义化而造成某些成分的句法语义变化。建议义副词与肯定性隐含义相关,规劝义副词、表意外及不确定性的话语标记或情态成分以及由疑问词发展来的否定副词都与反问句中的否定性隐含义相关。由此可见,反问句的肯定性隐含义和否定性隐含义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对称,否定性隐含义更为突显,更容易规约化而引起语义变化。

(2)使句中原本不表疑问的成分受句子整体语气的影响而携带上反诘语气,进一步发展为表示疑问的成分,如“敢”“可”从助动词变为疑问副词。

(3)反诘语气带有强调意味,因此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成分可以发展为强调标记,如口语中的“不是”在反问句中发展出确认用法。

反问句形式与陈述句相比,带有强调性,主观性程度高,反问句形式的选择是言说者采取的一种积极的语用策略。反问句是引起语义变化的一个重要环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语义的变化与语用是密切相关的。

参考文献:

- 董秀芳 (2002):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四川民族出版社。
- 董秀芳 (2007): 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 《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 50-61 页。。
- 姜宝英 (2008): 具有规劝义或提议义的“何 X”的历时考察,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
- 姜炜、石毓智 (2008): “什么”的否定功用, 《语言科学》第 3 期: 270-277 页。
- 江蓝生 (1992): 疑问副词“颇、可、还”,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又收入《近代汉语探源》, 商务印书馆, 2000: 65-94 页。
- 吕叔湘 (1985/1992): 《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85。又收入《吕叔湘文集》(第三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Schiffrin, D.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试论量词“串”对名词选择的范畴化过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宗守云

内容提要 量词“串”对名词的选择是个范畴化过程。“串”范畴以中心成员“珠子”类名词为起点进行扩展。“串”范畴扩展包括近距扩展和远距扩展两种情况,近距扩展是从“珠子”到其他变形串状物再到定形串状物,远距扩展是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固体物到流体物、从实在物到印记物、从空间物到时间物、从具体物到抽象物。“串”的范畴化过程和“串”对名词选择的历时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关键词 串 量词 范畴化 认知

量词“串”可以和多种名词形成选择关系。例如:

(1) 一串玉米;一串香蕉;一串烤肉;(铁丝上落着)一串苍蝇;一串气泡;一串号码;一串雷声;一串意思。

这些名词内部差异很大,但既然都可以接受“串”的选择,说明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共性和联系的。这些可以接受“串”选择的名词是一个有共同意义的整体类别,可以称为“串”范畴。和任何其他范畴一样,“串”范畴内部成员也有着等级差异,有的处于范畴的中心位置,是中心成员;有的处于范畴的边缘位置,是非中心成员。范畴内部是以中心成员为起点进行扩展的,这样的扩展过程就是范畴化过程。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串”范畴的中心成员,然后以范畴的中心成员为起点分析其范畴扩展的途径和机制,通过对“串”范畴化过程的分析,在这些多样的名词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1.量词“串”的语义基础及“串”范畴中心

1.1.量词“串”的语义基础

量词“串”的基本意义是:用于连贯在一起成为整体的事物。量词“串”的基本意义是在它自身词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根据谷衍奎(2003:276),“串”是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像以绳或棍穿物的形状,《说文解字》失收“串”字,在《正字通·丨部》,“串”被解释为“物相连贯也”,这是“串”的本义。换句话说,“串”的本义就是把事物连贯在一起,这是动词的用法。由于转喻引申,“串”一方面发展出名词的用法,表示连贯在一起的事物;一方面发展出量词的用法,用于连贯在一起的事物。“串”在语法上用作量词,在意义上仍然表示连贯在一起。

1.2.“串”范畴中心

根据量词“串”的基本意义,“串”用于连贯在一起成为整体的事物,这是它的认知语义基础。“串”范畴中心成员,应该是表示典型的连贯在一起成为整体事物的名词。那么,

哪一类接受“串”选择的名词是范畴中心呢？根据对量词“串”所选择名词的历时状况、使用频率等分析，可以肯定，居于“串”范畴最中心位置的是“珠子”类名词：

(2) 一串珠子（包括数珠、佛珠、珍珠等）。

首先，“串”对“珠子”类名词的选择在历史上出现最早。根据刘世儒（1965：246），“串”是在唐五代开始用作量词的，最早只和“数珠、佛珠”形成选择关系。例如：

(3) 赐远公如意数珠[一]串，六环锡杖一条，意（衣）着僧依（衣）数对。（黄征、张涌泉校注本《敦煌变文校注·卷二·庐山远公话》）

(4) 水精佛珠两串，银装刀子六柄，斑笔甘管，螺子三口。（〔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5) 一串数珠长在手，声声相续念弥陀。（《敦煌变文集新书》）

例（3）、（4）出现在唐代，例（5）出现在五代，这都是量词“串”的早期用例。量词“串”最早和“珠子”类名词形成选择关系，一方面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和人类经验基础之上，根据陈颖（2003）的研究，宋代苏轼作品中量词“串”只出现了一例，这一例就是用于“珠”的，陈颖（2003：76）认为，“‘串’常用于称量‘珠’，因为珠子是最容易也是最需要串起来的”；另一方面，这样的选择可能和佛教的发展、盛行有关，因为这些早期用例基本上是在与佛教相关的文献中的。

其次，量词“串”和“珠子”类名词相搭配，出现的频率很高，这在古今都是如此。根据对北大汉语言中心语料库的考察，在古代汉语库中，量词“串”共出现 218 次，其中和“珠子”类名词形成选择关系的就达 114 例；在现代汉语库中，量词“串”共出现 1047 次，其中和“珠子”类名词形成选择关系的有 153 例，虽然频率不及古代汉语，但相比而言，还是远远高于对其他类名词的选择的。

再次，量词“串”选择“珠子”类名词，具有思维上的优先性，表现为，在举例的时候，首先常常想到这一语言事实。比如，赵元任（1979：267）在《汉语口语语法》中，量词“串”下面举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珠子”；在《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名词、量词搭配表》中，“串”选择的名词有三个，“珠子”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是“眼泪、鞭炮”）。

还有个语言事实也可以支持这一点，从构词情况看，类似“量+名”构成的词语非常少见，只有“串珠、串铃”两个（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串”只和“珠、铃”这样的名语素凝合成词，说明量词“串”和“珠”之间的选择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已经词汇化了。

2. “串”范畴的近距离扩展

范畴扩展有幅度差别，有的扩展幅度小，还较多地保留着范畴中心成员的特征，可以称为范畴的近距离扩展；有的扩展幅度大，和范畴中心成员的共性不多，可以称为范畴的远距离扩展。

就“串”而言，范畴的近距离扩展仍然限于像“珠子”那样的表示连贯在一起的具体事物名词，这些名词也像“珠子”一样，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关日常用品（包括食品），而且是稳固的、静态的、具体的事物。例如：

(6) 一串辣椒；一串腊肉；一串铃铛；一串鞭炮；一串项链；一串璎珞。

(7) 一串钥匙；一串风铃；一串葡萄；一串荔枝；一串羊肉串；一串糖葫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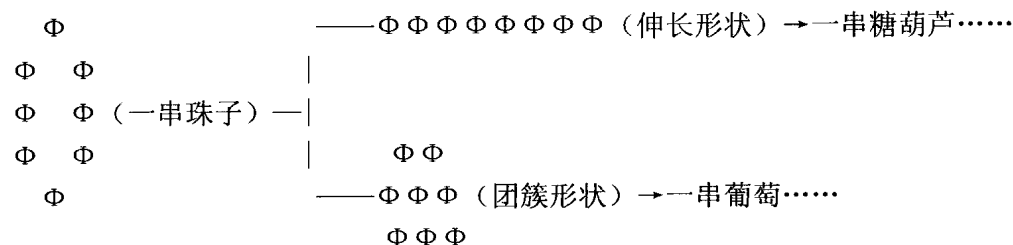
例(6) 距离范畴中心最近，它们是范畴中心最自然的延伸。“一串辣椒、一串腊肉”是食品，“一串铃铛、一串鞭炮、一串项链、一串璎珞”是用品，它们和“一串珠子”所具备的特征基本相同。范畴扩展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约定性质，但并不是任意的，是靠某些动因(motivation)促发的。范畴扩展的动因包括：隐喻，转喻，意象图式的转换，常规的内心意象(Lakoff1987: 104-109)。例(6)都是在范畴中心的基础上扩展的，其扩展的动因都包含着隐喻：“一串辣椒、一串铃铛”等同“一串珠子”在形状上具有像似性。

“一串项链、一串璎珞”作为范畴扩展的结果，其动因除了隐喻外，还包含了转喻。“项链、璎珞”是整体概念，它们不是连贯之物本身。“一串珠子”，是把珠子连成一串，“一串辣椒”，是把辣椒连成一串，而“一串项链”和“一串璎珞”并不是把项链和璎珞连成一串。“项链”是用金银或珍珠等制成的链形首饰，“璎珞”是用珠玉穿成的装饰品。可见，“一串项链”串的是金银或珍珠等物品，“一串璎珞”串的是珠玉，因此实际上是“一串金、一串银、一串珠、一串玉”，而“一串项链”和“一串璎珞”是用整体转指部分，是转喻性质。

例(7) 虽然也表示具体事物，但它们已经偏离了范畴中心。从形状上看，“一串珠子”和“一串葡萄、一串糖葫芦”是各不相同的，根据我们朴素的认识，它们之间的形状差距是很大的。“一串珠子”居于范畴最中心的位置，因此，“一串珠子”的形状应该是“串”典型的形状，而“一串葡萄、一串糖葫芦”的形状应该是在“一串珠子”的基础上形成的。

根据常规的内心意象，“一串珠子”的形状表现为：伸展开来是伸长形状，缩合起来是团簇形状。因此，“一串珠子”是变形串状物。相应地，“一串辣椒”等也是变形串状物。

在例(7)中，“一串钥匙、一串风铃、一串葡萄、一串荔枝”表现为团簇形状；“一串羊肉串、一串糖葫芦”表现为伸长形状。它们都是定形串状物。这是意象图式转换所导致的。认知语言学认为，对复杂的概念来说，凡是涉及形状、移动、空间关系的知识，都是以意象图式模式储存的(赵艳芳 2001: 73)。量词“串”是涉及形状的，它和名词组合以后所形成的复杂概念也就必然是以意象图式模式储存的。意象图式是可以转换的。在“串”范畴中，“一串珠子”在常规内心意象的基础上形成了“伸展开来是伸长形状，缩合起来是团簇形状”这样的意象图式，把这个意象图式加以分解，就得到了伸长形状的意象图式和团簇形状的意象图式：



例(7) 内部比较复杂。“一串钥匙、一串风铃”是人为串成的，而“一串葡萄、一串荔枝”是自然形成的，显然在“串”范畴中，后者不如前者典型。前人的一些论述也说明了这一点。邢福义(2003: 103)认为，量词“串”的理据角度是相关动态，也就是说，“串”的典型用法应该是和动作相关的，是人为的结果。邵敬敏(1993: 182)认为，“串”是利